

#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sup>\*</sup>

原 磊<sup>1</sup> 王 山<sup>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北京 10010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内容提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全面清晰地阐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本质与内涵是理论认识和发展的客观要求。理论逻辑层面,本文构建现代化逻辑与产业体系逻辑双维时空分析框架,探究二者动态互动、相互支撑的内在逻辑。时间演进视角下,现代化逻辑可从起点、路径、发展方式与价值导向四个方面进行理论阐释,形成起点判断—路径选择—方式转变—价值实现的递进逻辑链条;空间系统视角下,产业体系逻辑可从产业要素、产业结构、产业动力与产业功能四个方面进行理论阐释,拓展了系统论原有逻辑框架的动态解释力。在理论阐释基础上,本文基于不同逻辑之间的侧重点与内容关联,建立了现代化逻辑与产业体系逻辑之间的映射关系,构建了关键的分维路径模块:一是基于起点逻辑和产业要素逻辑,建设现代化的产业要素体系;二是基于路径逻辑和产业结构逻辑,建设现代化的产业结构体系;三是基于发展方式逻辑和产业动力逻辑,建设现代化的产业动力体系;四是基于价值导向逻辑和产业功能逻辑,建设现代化的产业功能体系。本研究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构建与实践探索提供了系统性参考。

**关键词:**现代化产业体系 理论逻辑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5)10—0005—21

## 一、引 言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家层面重大发展战略被正式提出,经历了孕育形成和发展完善的政策演进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的孕育奠定了基础,可视为这一战略的早期雏形。改革开放后,我国以经济杠杆来推动产业体系的建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体系逐渐建立并不断发展,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新世纪以后,我国以信息化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提出“两化融合”战略。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四化同步”,强调“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可看作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的形成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四位协同”产业体系建设做出的新的表述和部署标志着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框架趋于成型。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内涵更为丰富,地位更加重要,而且与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步走”战略相呼应。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和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对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系统阐述,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和实践路径(邱霞和原磊,2024)<sup>[1]</sup>。

收稿日期:2024-12-15

\*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库建设专项“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学术阐释数据库”(2024SJK007)。

作者简介:原磊,男,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产业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电子邮箱:yuanlei@cass.org.cn;王山,女,助理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创新,电子邮箱:wangshan@cass.org.cn。通讯作者:王山。

全面清晰地阐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本质和内涵是理论认识和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现有研究主要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与特征,以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路径等议题进行了思考。党的十九大之前,学者们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解主要集中于产业融合(刘钊,2011<sup>[2]</sup>;詹懿,2012<sup>[3]</sup>)、创新驱动(朱孟晓和杨蕙馨,2016<sup>[4]</sup>)和结构优化(芮明杰,2018<sup>[5]</sup>)等视角。随着党的十九大“四位协同”产业体系的提出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新发展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学界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认识逐步向要素协同(洪银兴,2019<sup>[6]</sup>;刘志彪,2023<sup>[7]</sup>;黄群慧,2023<sup>[8]</sup>)、产业特征(赵霄伟和杨白冰,2021<sup>[9]</sup>;白雪洁等,2022<sup>[10]</sup>)等视角拓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界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再认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赋予了现代化产业体系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黄群慧和盛方富,2024<sup>[11]</sup>;洪银兴,2024<sup>[12]</sup>;曲永义,2025<sup>[13]</sup>)。

实践探索方面,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路径设计。一类研究立足于产业体系的完整逻辑,主张从结构、组织、技术、金融、政策等不同层面协同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孙智君等,2023<sup>[14]</sup>);另一类研究关注新时代产业体系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围绕经济发展质量、增长方式转型、市场机制定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关键问题,提出要着力增强产业体系的基础能力、提升韧性水平及提高数字化精度,以应对国内外多重压力(张军和石炼,2023<sup>[15]</sup>;林善浪,2023<sup>[16]</sup>;李海舰等,2024<sup>[17]</sup>);还有一类研究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坚持创新引领、强化链条韧性、深化要素协同、锚定价值体现等(刘如等,2024<sup>[18]</sup>;张其仔,2024<sup>[19]</sup>;曲永义,2025<sup>[13]</sup>)。

尽管现有研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内涵界定、特征提炼与实践路径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分析视角偏一般化,缺乏理论逻辑的系统解构。现有研究聚焦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结构特征与要素特征的整体性阐释或解构(徐金海和夏杰长,2023<sup>[20]</sup>),尚未系统把握与辩证理解现代化与产业体系之间的逻辑关联。二是现代化与产业体系各自的本体内涵未被充分揭示。研究多停留在将现代化作为背景性论述或泛化为“先进性、安全性与完整性”三个特征,将产业体系等同于产业,忽视了产业体系中“体系”二字所蕴含的系统性内涵。三是建设路径普遍遵循“大而全”的一般化视角,缺乏“中国式现代化”独特背景下的“风格”设计。中国式现代化并非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以“中国特色”为导向。若忽视共同富裕、安全可控等独特要求,容易在实践中套用资本逻辑、“市场万能”或“技术至上”等思路,难以契合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实际需求。

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文认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可以从现代化与产业体系两个视角入手。从现代化逻辑视角看,产业体系现代化过程复杂艰巨,并非一气呵成,而是长期积累、循序渐进、持续优化、螺旋上升的过程,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体现为以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新旧动能转化、功能转型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演进过程,具有阶段性、递进性与开放性等特征。从产业体系逻辑视角看,产业体系不是若干产业门类的机械拼接,而是产业内部各要素之间、产业门类之间、产业各环节之间的有机融合、相互嵌套的复杂系统,体现为要素优化配置、结构协调、动力转换与功能互补的高度集成特征。本质上,现代化逻辑是一种时间序列逻辑,强调的是产业体系在时间维度上的现代化演进;而产业体系逻辑则是一种时间切面逻辑,表现为空间维度上的展开,注重特定发展阶段产业体系的整体性、协调性等。两个逻辑构成产业体系现代化过程的时空结构。现代化为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方向指引与战略目标,明确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使命与路径选择;产业体系作为现代化发展战略在产业维度的具体体现,则为现代化愿景实现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与产业载体。二者动态互动、相互促进,体现出国家宏观战略目标与具体实践载体的高度统一。因此,本文将从现代化逻辑和产业体系逻辑两个方面深入分析,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进行阐释,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路径。

## 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代化逻辑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是一个持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遵循自身内在逻辑、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客观过程。为更系统地认识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动态演化过程,基于时间演进视角,可从以下四个逻辑理解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涵义。

一是起点逻辑。后发国家通常从经济落后、技术积累薄弱、产业体系不完整的起点起步,依托自身要素禀赋,发挥后发优势或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寻找突破口。此阶段聚焦于回答落后国家如何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加速关键发展要素的积累与优化配置,在较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二是路径逻辑,以工业化为主导。工业化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前提、物质基础与必由之路,通过轻工业向重工业、初级加工向高附加值制造的转型,推动产业从“有没有”到“全不全”再到“优不优”发展,为现代化进程夯实产业根基。三是发展方式逻辑,以技术创新作为驱动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抓手。此逻辑下,产业发展不再依赖传统生产要素投入或低成本优势模式,而是为回应时代面临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通过突破性技术创新对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进行深层次变革,既是对旧范式的颠覆,又是新范式的生成,体现产业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内源式创新驱动本质。四是价值导向逻辑,以为人类服务、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主要特征,赋予产业体系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的使命。此逻辑体现现代化追求的更高阶目标,关注人的素质提升、能力拓展和生活质量整体改善等,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致力于构建以人为本、功能完备的产业体系(罗荣渠,2004)<sup>[21]</sup>。

本质上,起点逻辑侧重于立足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与起点条件,回答“从哪里出发”“优势是什么”“如何有效起步”等关键命题;路径逻辑核心在于回应“如何发展”的问题,着力解决工业化基础不够扎实、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不高、工业布局不尽合理、工业劳动者素质有待提升等制约产业体系现代化的结构性问题,探索符合国家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的最优路径;发展方式逻辑重点探讨“产业怎样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其内涵在于以技术创新为主导力量,通过硬核创新突破外部技术封锁、摆脱路径依赖,重构技术—经济范式,争夺技术主导权与产业话语权,推动产业体系建设实现由“追赶”转向“引领”;价值导向逻辑指向“发展为了谁”“发展达到何种目标”的根本问题,体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关切和终极关怀。这四个逻辑形成起点判断—路径选择—方式转变—价值实现的产业现代化动态演进逻辑,提供了认识现代化的阶段特征与内在机制。为此,本文从起点逻辑、路径逻辑、发展方式逻辑与价值导向逻辑四个方面构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代化逻辑的理论基础。

### 1. 起点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产业基础薄弱的国家赶超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关键在于特殊历史条件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体系的建设不仅关乎物质基础的奠定,更是现代化进程的前提保障,只有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结构较为合理的产业体系,才有可能实现其他发展目标。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三次不同范式转换(黄阳华,2020)<sup>[22]</sup>,对于后发国家如何建立产业体系也提出不同建议。Rosenstein-Rodan(1943)<sup>[23]</sup>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后发国家因资本积累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及市场失灵,难以依靠市场自发形成产业体系,需政府实施结构性政策,通过投资那些带动系数大的支柱产业与公共基础设施推动产业分工形成。Krugman等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则强调市场机制的普遍有效性,以“市场失灵”为名扭曲价格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反而会导致“政府失灵”,因此提出政府要减少对市场活动的干预,避免对产业发展的过度保护。新古典经济学家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政策主张,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Reinert等演化发展经济学家则批评了“华盛顿共识”所推行的全面自由化

主张,认为穷国和富国差异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从事了不同质量的经济活动,而正是相应经济活动的选择导致了相应的产权结构和制度体系(赖纳特,2010)<sup>[24]</sup>。穷国在贸易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下往往会选择一些低质量的经济活动,此类经济活动在劳动不断投入的情况下,最终会导致边际生产率下降,规模报酬递减,并且容易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为了推动穷国向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方向发展,政府需要制定长期、全面的发展战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优化资源分配,改善发展环境,促进社会稳定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从起点逻辑看,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获得三个方面的理论启示。

(1)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充分考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一个国家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不同阶段,需要重点解决不同的主要矛盾。在产业体系建立的初期,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克服发展障碍,形成工业部门全面大规模投资,从而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和持续深化的分工体系,达到经济“起飞”的目的。当产业体系达到一定规模后,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打造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当产业体系发展已较为成熟,传统发展动力面临衰竭,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如何通过发展模式转换,跳出产业发展的“结构性陷阱”(芮明杰,2018)<sup>[5]</sup>,由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旧产业体系转向以新兴产业为主体的新产业体系,从而激发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塑造产业发展新形态。

(2)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满足新古典经济学严格假设下,市场机制是充分有效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都无法实现帕累托改进,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应当最小化。然而,现实中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协调失灵、外部性等问题,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达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相统一,必须依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有为政府可以通过保持市场公平竞争和稳定运行,协调市场主体统一行动,提供创新环境和创新政策鼓励技术创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协调投资者、企业、消费者、社会公众各方利益等方式,为产业发展创造条件;有效市场则应当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基于市场价格和供需关系及时做出反馈,引导生产要素向着更高效率、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领域流动。

(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充分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创新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驱动力,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既依赖于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不断突破,也依托于制度、管理层面的创新。通过强化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够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竞争力。同时,创新与需求之间形成循环累积的互动关系,创新催生新需求,需求又反过来推动进一步创新。一方面,创新可以推动新知识、新分工的涌现,利用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提升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增加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从而带来社会有效需求的提升;另一方面,创新也会创造新的需求,这些新的需求又进一步衍生出更多新产品新服务,形成新业态新产业,从而激发更高的投资和技术升级,推动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唯有把创新作为主导力量,才能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持久动力,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 2. 路径逻辑

从世界各国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来看,产业体系发展过程就是找到符合自身国情发展路径的过程,这一路径集中体现为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在工业革命开始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体系,所谓产业不过是种植业和零散的手工业,产出效率十分低下,且无实质增长,世界经济长期处于“马尔萨斯循环”。据统计,公元元年到1000年,全球人均GDP增长为0,而1000—1820年,全球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也仅为0.05%(麦迪森,2022)<sup>[25]</sup>。后来,工业革命爆发并扩散,产业体系才逐渐形成,也带动了产出效率的快速提升。全球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逐步提高,1870—1913年已经达到了1.3%,二战之后更是迅速提高,1950—1973年达到了2.93%

(麦迪森,2022)<sup>[25]</sup>。就我国而言,现代化发展初期的产业基础极为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产业基础十分落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工业部门残缺不全,重工业几乎为零,只有少量的轻工业,1950 年我国 GDP 总量仅占全球 4.5%(麦迪森,2022)<sup>[25]</sup>。后来,在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导向下,我国搭建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产业规模仍然较小。改革开放前的 1977 年,我国经济总量在全球所占比重仅为 2.38%,处于极为有限的水平<sup>①</sup>。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快了工业化进程,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参与全球分工,引导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了工业规模和效率快速增长,并带动农业和服务业不断发展,经济规模也迅速扩大。2023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 18 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约 17%<sup>②</sup>。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世界来看,还是从我国来看,工业化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从路径逻辑来看,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获得三个方面的理论启示。

(1)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依靠工业化推动产业门类拓展。工业化可视为经济运行中一系列生产函数持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往往首先发生在个别生产单位,随后逐渐扩展,并以主导形态渗透至整个社会的生产体系(张培刚,2008)<sup>[26]</sup>。世界上从最初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到形成了涵盖联合国分类目录下的 17 个门类、60 个大类的庞大产业体系,本质上是工业化推动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我国也经历了类似路径,从“一穷二白”到如今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规模巨大、分工协作的现代产业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积极融入全球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结果。

(2)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依靠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演变。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工业化进程往往遵循一定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律。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伴随人均收入不断提升,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将出现系统性转移,即逐步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克拉克,2020)<sup>[27]</sup>。在此基础上,库兹涅茨(Kuznets,1971)<sup>[28]</sup>认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业部门收入占比和劳动力占比均下降,工业部门收入比重上升且劳动力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部门收入基本稳定而劳动力比重上升。霍夫曼通过分析近 20 个国家的工业结构时间序列数据,揭示了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的动态演变规律(苏东水和苏宗伟,2021)<sup>[29]</sup>。本研究认为,产业结构演变是专业化分工深化的结果,在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很多生产辅助性活动往往由企业内部提供,后来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和促进技术进步,这些活动分离出来成为单独部门,形成了单独核算的新产业并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进入,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当然,世界各国推进工业化进程中,自身的资源禀赋和面临的外部条件并不相同,在总体上遵循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的同时,也会呈现多元化路径,表现出不同特征。

(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依靠工业化推动产业效率提升。工业化的重要特征就是新的科学技术不断得到应用,从而带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与传统手工业时期通过师傅带徒弟或者基于经验教导的技艺不同,科学技术是基于科学发展而产生的。目前,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工业发展仍在提升整个产业体系效率中发挥主导作用,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与传播的重要主体(黄群慧,2021)<sup>[30]</sup>,工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现代化的基础,因此必须要以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

### 3. 发展方式逻辑

发展方式逻辑的核心在于依托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发展范式的跃迁,推动产业体系的系统性重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科技创新已演变为国家间战略博弈的关键阵地,各国围绕科技制高点展开激烈竞争,以重塑全球科技格局、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因此,必须坚持

① 世界银行.GDP(现价美元)[EB/OL].<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2025。

② 世界银行.GDP(现价美元)-China[EB/OL].<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2025。

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主动探索新领域、开辟新赛道,确保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先机,进而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中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正如库兹涅茨(Kuznets)在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中指出的那样,知识的重大突破构成了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源泉,它们一旦广泛扩散,便形成“划时代的创新”。经济史的演进并非均质连续,而是可以划分为由不同“划时代创新”所界定的若干经济纪元。每一纪元都以重大知识突破及其所引发的独特经济增长模式为核心特征(佩蕾丝,2007)<sup>[31]</sup>。从发展方式逻辑来看,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获得三个方面的理论启示。

(1)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充分吸收科技革命最新成果。科技革命往往带来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产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从而带来产业革命的孕育和爆发。当前全球正处于科技和产业深刻变革期,未来几十年全球科技创新将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从而带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密切跟踪科技前沿动态并洞察科技发展趋势,把握可能引发产业结构变革的关键技术发展趋势,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前瞻性布局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以增强产业体系的自主性、安全性与竞争力。

(2)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创新技术-经济范式。科技创新是推动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的根本动因(佩蕾丝,2007)<sup>[31]</sup>,而能否创新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国家决定能否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成果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性因素。可理解为特定历史时期主导技术组合及其衍生的社会-制度架构,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由若干重大且紧密相关的技术组成的主导技术结构。随着通用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与之相关的“技术族群”将大规模涌现,不同技术路线并行推进、激烈竞争,最终竞争中获胜的技术将成为主导技术,而众多主导技术结合形成主导技术结构。何种技术能够成为主导技术,除了技术自身的优劣性以外,更多是与企业初始选择和基础设施投资有关,从而形成了路径依赖并不断自我强化。对于国家来讲,必须尽可能创造良好环境,使更多本国企业在技术路线之争中胜出。二是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形成相匹配的生产方式、组织模式和商业模式。新技术往往引发产业边界重组和价值再造,推动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只有及时调整或重塑生产方式、企业组织形态及商业运营模式,才能有效承接技术扩散所带来的新机遇,形成与新技术发展相协调的产业运行体系。三是发展变迁的制度结构。科技革命的推进,不仅改变了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而且也深刻地改变了制度结构。宏观制度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必须适应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科技革命成果的更好应用。由于制度本身存在刚性,社会制度变迁往往跟不上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从而成为产业发展的阻碍。为了更好地释放科技革命的潜力,必须推动制度变迁。

(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的重要作用。金融在服务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赋能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是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科技创新涉及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再到市场化应用的全过程,每一环节都需依赖金融资本的支持。金融通过风险投资和银行贷款等方式,为新技术的集中研发和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分散科技创新过程的风险。金融通过创新的风险管理工具和手段,如科技保险、风险投资等,降低了科技创新的风险,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三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科技创新效率。通过将社会资金有效地组织起来,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能够有力地促进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四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追求盈利,金融资本往往会从利润率较低的成熟产业和衰退产业中退出,进入盈利水平更高的新兴产业,从而促进产业体系的新老更替。

#### 4. 价值导向逻辑

产业体系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再局限于物质产出的极大化,而是致力于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体系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最终衡量标准应当是

人的现代化程度,即与产业体系现代化相匹配的人的发展程度。此价值导向逻辑标志着产业体系从“生产体系”向“发展体系”再向“价值体系”的演进,是产业体系现代化走向更高形态的关键体现。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蕴含三个核心维度:一是劳动能力的发展。劳动能力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包括体力、智力和技能的提升等,使其具备适应现代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产的能力,提高生产效率(马克思,1979)<sup>[32]</sup>。二是社会关系的丰富。丰富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合作和沟通,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参与和融入。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提升个体的社会资本,增强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凝聚力(马克思,1979)<sup>[33]</sup>。三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全面发展,包括个人兴趣、爱好、价值观、创造力、道德品质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要求创造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和机会以满足不同个体的需求(庞世伟,2009)<sup>[34]</sup>。从价值导向逻辑看,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获得三个方面的理论启示。

(1)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注重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与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劳动能力的发展是劳动者适应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要求。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在于科技进步,但根本依托仍在人。必须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能够适应现代化生产需求并与产业发展体系相匹配的现代产业劳动者队伍,才能为产业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为此,一方面,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大力提升产业工人队伍的素质与技能,使其具备先进的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以满足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完善创新技能导向的激励机制,改进产业工人技能评价制度,优化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充分发挥产业工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唯有提升劳动者整体素质,激发其创造潜能,才能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长久动力,并塑造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优势。

(2)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更好地满足本国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关系的丰富不仅意味着健康的情感关系以及有效的人际沟通,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个体如何通过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社会关系的扩展本质上离不开物质生产与文化供给。只有当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时,个体才更积极参与社会交往,融入社会;同时,随着人民对多元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的增长,社会关系的进一步丰富也更依赖于高质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支撑。由此可见,社会关系的丰富与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是紧密相连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从根本来讲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因此,应着力破除制度、技术、成本等多重制约,推动产业体系内部各要素的有机协同与整体提升,不断提升物质生产能力和文化供给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高品质的物质文化需求。

(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推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层次,共同富裕正是实现个性全面发展的必要保障。共同富裕的核心不仅体现在成果的公平分配,即人民群众能够平等共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的发展成果,更体现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全员参与、发挥作用与贡献智慧力量,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让每个人都能在价值创造中获得尊严,在价值流动中实现共享。共同富裕由此成为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它既通过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个性的全面发展,营造和谐共生的群体关系,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与合作,减少社会矛盾、摩擦和冲突;也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推动知识和技术的交流与共享,促进不同领域的合作,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繁荣的社会。

### 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产业体系逻辑

系统论把系统定义为由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多个元素(或子系统)所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的环境与结构共同决定系统的功能(郭雷,2016)<sup>[35]</sup>。从系统论视角看,一个系统

可从组分、结构、环境与功能四个元素来理解。组分是系统的基本构成单元,可表现为要素、元素和部分或子系统;结构揭示这些组分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与相互关系,即系统的组成架构或组分关联的总体模式;环境则指系统所处的外部条件与约束因素,对系统运行产生影响并构成其适应与演化的背景;功能则是系统的组分效应、结构效应、环境效应共同作用所表现出的系统性质、能力和功能。

系统论认为,所有事物的本质均可理解为系统,产业体系亦不例外。产业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运行机制复杂、演化路径多元、外部影响显著,更需要从系统思维视角予以深入剖析,总结其运行逻辑与演进规律。基于系统论关于“组分—结构—环境—功能”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进一步发展出适用于产业体系理论研究的“产业要素—产业结构—产业动力—产业功能”四维分析模型。其中,产业要素对应系统的“组分”,包括人力、土地、技术、资本、数据等资源型要素,其积累优化和创新性配置是产业体系得以运转的资源基础与前提;产业结构直接继承系统的“结构”维度,指各类产业之间的组织方式或协同关系,如产业链、价值链、区域分工等,是引导产业体系内部协调与结构优化的核心;产业动力是系统在开放条件下与外部环境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或某种形式的交互作用中将外部压力转化为系统演化的内在驱动力,是产业体系现代化演进的“发动机”,决定着其现代化演进方向及路径;产业功能则保留了系统“功能”维度的基本内涵,强调产业体系在支撑经济运行、保障经济安全与服务社会发展等方面所承担的多重综合功能,是评估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维度。

本文将系统论中“环境”维度表达为“产业动力”,旨在突出产业体系演化过程中的内外部驱动力量。相较于“环境”这一侧重于外部性且相对静态的表述方式,“动力”更能体现出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市场需求等因素对产业体系演进所产生的驱动效应,不仅拓展了系统论原有逻辑框架的动态解释力,也体现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应对复杂环境时表现出的主动适应性。基于此,本文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围绕产业要素逻辑、产业结构逻辑、产业动力逻辑、产业功能逻辑四个维度系统阐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基础。

### 1. 产业要素逻辑

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是人类的目的活动(即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马克思,2009)<sup>[36]</sup>,而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也是产业发展所必须的各种要素。产业要素既包括与劳动相关的要素,例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各类劳动者,也包括与劳动对象相关的要素,例如土地、原材料、矿产资源、数据等,还包括与劳动手段相关的要素,包括厂房、机器、设备、智能化工具等。产业要素的积累升级能够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要素支撑,也是国家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的重要体现。从产业要素逻辑来看,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获得三个方面的理论启示。

(1)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与产业要素禀赋条件相适应。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资源禀赋不同,这些资源禀赋的组合和利用水平直接决定了产业发展面临的产业要素条件,而不同的产业要素条件又会影响产业的发展路径和布局结构。为充分利用本国丰富的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可重点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可采取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实现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与此同时,为充分利用资本优势,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化资本配置,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为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可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科技创新或技术引进,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实现产业要素的优化配置。产业要素结构是指构成劳动过程的最基本单元的结构,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等生产要素的构成和组合状况。从劳动者

角度看,主要涉及劳动者的数量、素质、技能结构及其分布状况;从劳动对象角度看,关注生产材料、资源类型及其可获取性;从劳动手段角度看,则包括生产工具、设备及技术条件的配置与应用方式。同时,产业要素之间也存在结合关系和替代关系。从结合关系视角看,一定科技水平的产业要素要与相应水平的产业要素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生产力,例如先进的生产工具要与高素质的劳动者相结合,先进的能源技术要与高水平的基础设施相结合等;从替代关系视角看,产业要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替代,例如机器设备可以部分替代人工劳动等,影响生产效率和要素配置方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充分考虑产业要素的结合关系和替代关系,通过优化产业要素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培育新型产业要素。新型产业要素的供给和使用,直接决定了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是产业生产经营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其中,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可视为新型产业要素,而人才是承载这些新型产业要素并实现其价值的载体。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存在一个发挥特殊作用的关键生产要素,该要素不仅是该阶段生产能力的核心体现,也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被称为“第一生产要素”(钟茂初,1996)<sup>[37]</sup>。新型产业要素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下,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的“第一生产要素”,对于提高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新型产业要素的重要特点就是必须采取专业化方式进行长期培育才能形成。例如,人才是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有通过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才能推动生产力实现跃升;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从底层改变了传统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逻辑,充分赋能生产活动的全流程环节,然而数据必须采用信息化技术、智能化技术才能被生产出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围绕新型生产要素的培育,推动新产业新部门的形成,并通过经济循环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 2. 产业结构逻辑

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一方面体现为产业发展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体现为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协同配套、融合联动,以及产业体系对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的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不断提升产业的发展水平,提供更高质量更多品类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性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同时也要求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使各产业在数量比例、经济技术联系及相互作用方面逐步趋于协调。从产业结构逻辑来看,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获得三个方面的理论启示。

(1)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现代化产业体系体现为高新技术产业居于引领地位,现代农业发挥基础支撑作用,先进制造业承担主体功能,现代服务业则成为关键依托,从而共同构成新型的综合性产业体系(黄庆华,2024)<sup>[38]</sup>。产业结构合理化则通过科学调整各产业及其内部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功能分工和资源配置,实现产业体系的高效运行与可持续发展。衡量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关键,不仅在于各产业本身发展的水平,更在于通过内在的联系和互动所形成的综合效能,即能否产生超越单个产业之和的整体优势。合理的产业结构不仅有助于防止资源浪费与闲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还能够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提高整体经济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同时,多元化的产业结构能够增强经济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对单一产业的依赖,减轻单一产业波动对整体经济造成的冲击。

(2)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由粗放式向集约化、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不断演进的过程,旨在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向高端攀升,动态地、显著地提升经济效益,从而达到更高级别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主要包括提升产业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并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融合发展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产业结构高级化不

不仅要求产业层级不断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领域拓展,而且要求生产模式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由追求数量增长转向效益优化。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标志在于能否有效突破产业发展的“中低端锁定”,增强产业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高级化的产业结构通过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价值创造,增强经济韧性,提高生产效率。它还能带动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优化调整,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同时,高级化的产业结构能够更好地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和需求变化,推出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服务,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扩大在高端市场的占有率。

(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推动产业结构的生态化。产业结构生态化是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将生态文明理念系统融入产业结构调整、生产能源消耗、资源循环利用等全过程,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吕明元和陈维宣,2015)<sup>[39]</sup>,核心在于推动产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践途径主要体现在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强度、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比例、推动绿色技术和工艺广泛应用,以及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生态化的产业结构不仅要求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遵循生态约束,更要求产业链上下游绿色协同,推动原材料节约利用、废弃物再生循环、污染物减量治理,促进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加快壮大。衡量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资源投入最小化、污染排放最低化与生态环境效益最大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产业结构生态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它能够有效防范环境风险,塑造绿色发展新优势,吸引更多绿色投资与技术合作,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还能够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此外,产业结构生态化也能够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从而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与公众生活质量。通过推动产业结构的生态化,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赢局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 3. 产业动力逻辑

熊彼特(2000)<sup>[40]</sup>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与产业进步的根本驱动力。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既打破既有产业格局,使旧有结构被逐步淘汰,同时又孕育出新的产业形态,共同造就新的经济繁荣。正是这种持续的破坏与重建、更新与替代的动态循环,产业体系实现了自我革命与演化升级,确保经济保持长期活力与竞争力。创新活动主要由企业家精神驱动,核心要素主要包括新产品开发、生产方法革新、新市场开拓、新资源利用与新组织模式创建五个方面(熊彼特,2020)<sup>[41]</sup>。在创新活动中,科技创新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决定着其他方面创新的质量水平,因此,必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从产业动力逻辑来看,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获得三个方面的理论启示。

(1)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一个将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有机嵌入到产业生产体系,推动知识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并通过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应用不断催生新的价值形态的过程。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其核心不仅在于提升效率,更在于依托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及激励创新机制等非物质要素,实现生产要素的全新整合,从而实现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与商业领域的广泛运用与传播,旨在创造并驱动全新的经济增长。过去,我国的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外源式的创新驱动,主要体现在用于生产体系中的先进技术很多都是引进和模仿的,也就是说技术的源头是国外,这种模式到了现在已难以为继,必须要转变为内源式的创新驱动(洪银兴,2013)<sup>[42]</sup>。内源式创新驱动根本在于立足自主创新,强化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突破制约发展的“卡脖子”环节,形成一批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要坚持内源式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把科技创新作为产业演进的源头活水。

(2)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传统商业模式面临着巨大挑战,创新商业模式可以探索运用新技术、应用新理念或采用新方法打破传统商业模式束缚,通过重新定义产品价值、优化服务流程或探索新的收入来源等为企业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加速了企业智能化和数字化进程,实现了供应链优化、精准营销和个性化定制,提升了企业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商业模式创新还促进产业融合和跨界合作,创造新的市场和经济增长点,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兴商业模式的兴起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合作机会和发展空间。创新商业模式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高企业运营透明度、确保合规和诚信经营,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激励企业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商业模式,以有效应对市场变革与竞争挑战。

(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其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强创新驱动力,成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制造业等新产业不仅可以提升国家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还能创造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这些新产业依托最新科技成果,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链向高端延伸。与此同时,新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繁荣,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不仅直接推动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扩张,还促进了芯片制造、数据处理、软件开发等上下游产业的同步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同样带动了电池生产、智能电网、清洁能源设备制造等相关领域的繁荣。这种联动效应使得产业链上的各环节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和市场应变能力。

#### 4. 产业功能逻辑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通过科学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致力于质量、效率和动力的深刻变革,从而显著增强产业的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程度,从而为经济实现质量上的显著提升和数量上的合理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统筹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不断提升发展的集约性、安全性、包容性。从产业功能逻辑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获得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启示。

(1)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实现集约发展。集约发展是指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要素效率和依靠科技进步,实现以更少的投入获取更高的产出和更优的效益。其根本在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把增长的着力点放在质量提升、效率改善和动力转换上。衡量产业是否实现集约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在有限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下实现产出增长与效益提升的双赢。产业体系的集约化发展在更深层次上表现为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最终体现于产品、企业及产业的市场实现能力的增强。集约发展是适应全球竞争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能够为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和长期可持续运行提供坚实保障。必须持续改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与结构,以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强国际竞争力。一方面要关注市场占有率,产品或服务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越高,表明产业国际竞争力越强;另一方面要关注附加值率,经济主体新创造的价值在总体价值中所占比例越高,表明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际分工地位越高。

(2)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实现安全发展。发展与安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相互关联和互补,缺一不可。发展旨在提升民众生活质量,提高他们构建自己的未来的能力(托马斯和王燕,2017)<sup>[43]</sup>,为其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奠定物质基础;而安全则是为了捍卫国家整体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民众安居乐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全面

进步。安全是产业体系稳健运行和长期发展的基础。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靠,意味着在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国计民生以及国家安全等关键产业领域,必须进行充分的布局并提供有力的保障。在国家安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应保障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与强劲韧性,确保关键产业、重大基础设施等免受重大干扰,维护经济连续性和社会稳定。一方面需综合考量产业体系的完整性,特别是在关键产业领域,应有适度规模的布局;另一方面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中,本国企业拥有主导权,或者即使由国外企业提供,也应分散至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企业,如果某一供应渠道因突发事件而中断,可立即由其他渠道替代。

(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实现包容发展。产业体系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效率”上,而且也体现在“公平”上。只有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确保利益相关方公平正义、共赢共益地分享产业发展的多元化价值,才称得上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包容性作为体现社会发展的广泛性和规模的指标,强调了权利、机会以及特别是成果的普遍惠及性,而包容发展是指确保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公平合理地共同享有发展的权利、机会以及成果的一种发展模式(邱耕田和张荣洁,2011)<sup>[44]</sup>。要实现产业体系的包容发展,一方面,要让每个劳动者都有平等的机会来获取工作和发展事业,拥有同等的权利去展现和提升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应推动发展成果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更公平地分配,特别是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防止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被边缘化或排除在外。

#### 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路径

现代化逻辑与产业体系逻辑既非简单并列的范畴关系,也非静态的线性因果链条,而是在目标指向与载体支撑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促进、动态融合的逻辑关系。现代化为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方向引领,产业体系则承载并推动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具体实践中,需将现代化逻辑与产业体系逻辑深度融合。然而,面对要素错配、结构失衡、动力不足、功能滞后等产业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难点和痛点,若仍停留在泛化、笼统的一般性路径设计,不仅难以精准识别关键瓶颈与锁定重点发力方向,更容易忽视中国式现代化在共同富裕、安全可控、绿色发展等方面的核心追求。因此,本研究将现代化的四个逻辑分别映射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四个逻辑单元之中,构建可分解、可识别、可执行的分维路径模块。具体而言,基于起点逻辑与产业要素逻辑,建设现代化的产业要素体系,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要素基础;基于路径逻辑与产业结构逻辑,建设现代化的产业结构体系,实现产业结构从低端向中高端跃升;基于发展方式逻辑与产业动力逻辑,建设现代化的产业动力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价值导向逻辑与产业功能逻辑,建设现代化的产业功能体系,使产业体系更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路径如图1所示。这一路径设计既体现出现代化对产业体系建设的系统性嵌入,也增强了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路径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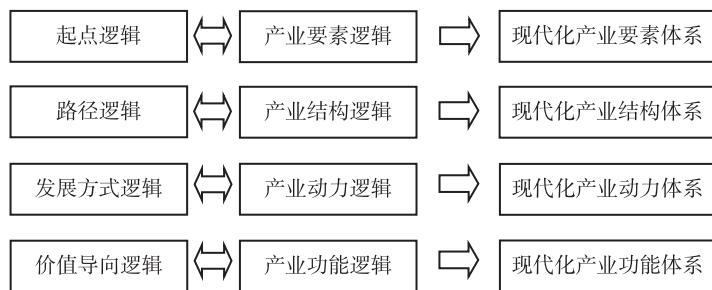


图1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1. 基于起点逻辑和产业要素逻辑,建设现代化的产业要素体系

起点逻辑以要素驱动为核心特征,侧重于从本国实际出发,识别并激活一切可调动的生产要素,完成基础资源的集聚与初始积累,推动产业体系的基本形态得以形成,这与产业要素逻辑所强调的要素可得性、匹配性与配置效率等高度关联,且产业要素逻辑也符合起步阶段的发展要求。因此,建设现代化的产业要素体系需充分把握起点逻辑和产业要素逻辑的深度融合(如表1所示),立足我国产业要素条件,明确建设现代化的产业要素体系的基本路径,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奠定资源基础保障。

表 1 起点逻辑和产业要素逻辑的深度融合

起点逻辑	产业要素逻辑
必须充分考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必须与产业要素禀赋条件相适应
必须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	必须实现产业要素的优化配置
必须充分发挥创新驱动作用	必须培育新型产业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1)适应发展阶段转换,推动产业要素升级。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面临的产业要素条件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劳动力成本已远高于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过去曾经被忽视的资源环境问题,现在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充分考量的重要约束变量。在此背景下,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已逐渐消耗殆尽。实际上,“红利”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力、土地或资本优势,而是演变为包括劳动者素质、资本积累、大规模外汇储备等在内的综合发展优势。我国劳动者素质大幅提升,202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已超过1170万,远高于美国和欧洲国家<sup>①</sup>。我国资本积累取得很大成绩,截至2025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33387亿美元,近日本的2.6倍,大规模外汇储备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维护金融稳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sup>②</sup>。我国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整体水平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25年7月,我国高速铁路在五十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超过97%<sup>③</sup>。我国科技能力大幅提升,截至2024年底,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75.6万件,是全世界首个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和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均跃居全球第一位<sup>④</sup>。面对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化,我国要积极推动产业要素升级,实现产业发展与要素积累协同推进,建立起以高级产业要素为基础的新型产业要素体系,塑造经济发展“高级红利”。

(2)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优化产业要素配置。有效市场通过价格、竞争和供求机制引导生产要素向高效率领域流动,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而有为政府则通过制度供给、战略引导与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在垄断、公共物品供给、外部性与公平分配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为市场有效运行与社会公平正义提供重要保障。从现阶段来看,我国在产业要素配置中必须要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沉淀成本等原因,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很难实现产业要素的结构优化和替代升级,而是要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具体来看,可以有两个着力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2024/zt01/mtjj/202408/t20240829\\_1147779.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2024/zt01/mtjj/202408/t20240829_1147779.html),2024-07-19。

<sup>②</sup>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5年9月末外汇储备规模数据[EB/OL]. <https://www.safe.gov.cn/beijing/2025/1024/2648.html>,2025-10-24。

<sup>③</sup>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我国建成全球最大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邮政快递网[EB/OL]. <https://tv.people.com.cn/n1/2025/0721/c413792-40526502.html>,2025-07-21。

<sup>④</sup>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一领域多个全球第一!看最新安排[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4/content\\_7020824.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4/content_7020824.htm),2025-04-24。

点:一是推动产业要素的结构优化,实现产业要素的合理搭配。例如为更好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必须优化人才的专业结构,重点培养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关键领域人才,同时加强对高校新工科建设的引导,促进高校新设如机器人工程、增材制造技术等急需紧缺专业。二是推动产业要素的替代升级,实现产业要素的新旧更替。例如,为更好应用科技创新成果,提高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必须要采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持续引导企业用更为先进、更加智能的机器设备、更为高效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来替代传统的机器设备、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

(3)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培育新型产业要素。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型产业要素已成为决定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性力量,而新型产业要素的形成,关键是要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第一,以创新推动知识积累和突破。世界范围来看,历次重大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是重大理论突破的结果,而人类知识就是在理论创新中形成,必须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以持续的理论创新实现知识积累和突破。第二,以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其中技术创新更多是在科学革命基础上,形成的重大技术突破,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而技术效率更多体现现有技术的改良以及在生产中更好得到应用。第三,以创新推动管理水平提升。管理活动本身就是创新的过程,既包括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也包括更好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管理效率,例如通过大数据决策的广泛应用,提高管理效能,降低经营成本;推动业务流程再造,改进生产工艺等。第四,以创新推动数据开发。数据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理论上讲任何活动都可以产生数据,但数据要成为产业要素却是需要经历“数字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使得数据的采集和利用变得经济可行。

## 2. 基于路径逻辑和产业结构逻辑,建设现代化的产业结构体系

从路径来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任务在于以工业化为主导打破制约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诸多结构性瓶颈,推动产业实现从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初级状态,迈向高技术含量、高效率的现代形态。该阶段的发展不仅依赖要素投入、外需拉动与规模扩张,更依赖于产业链条的完善、产业间协同的增强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是产业体系“量的积累”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逻辑关注产业“如何组合”“如何布局”“如何协同”等结构性问题。路径逻辑中的“产业门类完善”“结构优化”等目标需依托产业结构逻辑中的“链条改造”“布局优化”等来实现落地,而如果脱离工业化主导的牵引,产业结构则容易陷入路径依赖与低端锁定。二者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门类齐全、结构协调、链条完整、品种丰富、空间协同的系统性产业格局,推进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因此,构建现代化的产业结构体系,需充分把握路径逻辑和产业结构逻辑的深度融合(如表2所示),适应我国工业化阶段变化,推动产业转型发展,明确建设现代化产业结构体系的基本路径。

表2 路径逻辑和产业结构逻辑的深度融合

路径逻辑	产业结构逻辑
必须依靠工业化推动产业门类拓展	必须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必须依靠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演变	必须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必须依靠工业化推动产业效率提升	必须推动产业结构的生态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1)推动产业门类拓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就是产业门类不断拓展的过程。门类齐全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优势,在联合国划定的所有工业门类和细分领域当中,我国大多有所涉及。门类齐全意味着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从而更好实现经济自立自强。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可能像一些小国,仅仅依靠少数行业实现繁荣发展,而是必须坚持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对我国来讲,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贸易原理主要建立在“小国经济”假设基础上,而“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存在显著差异。对我国来讲,要遵

循“大国经济”的发展规律,继续拓展自身产业门类,尤其是在一些细分行业领域,不断扩大覆盖度和影响力,提升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之间协调发展,提高生产效率。

(2)推动产业结构演变,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超过 80%,构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石。长期以来,我国轻工、纺织、机械等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这些产业具备较强的带动效应、高度的产业关联性以及较高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同时也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力军。传统产业并不代表落后生产力,在融入科技创新成果后,其完全有可能转型升级为高科技产业。推动产业结构演进并非舍弃传统产业,而是促使其由劳动力、资源要素驱动向资本、技术要素驱动转型,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附加值水平。对我国而言,应充分应用新技术新应用加快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3)推动产业效率提升,实现产业结构的生态化。产业生态化是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以绿色理念为引领,将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要求全面融入产业链各环节,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产业绿色化水平已经成为判断产业结构优劣和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依据。绿色发展要求产业体系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通过统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支持清洁能源与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造成损害。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正是对此作出的价值回应与制度安排。它不仅强调在经济活动中统筹考虑资源环境约束条件,而且通过制度化设计推动绿色技术应用、清洁能源利用与循环经济发展,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福祉提升的协同统一。

### 3. 基于发展方式逻辑和产业动力逻辑,建设现代化的产业动力体系

此逻辑下以传统要素投入与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亟需转向依靠内生动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发展方式逻辑强调科技创新为行业发展核心驱动力。此阶段的科技创新并非三百六十行的技术进步或一般意义上的技术革新,而是通过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范式变革,实现技术主导权与产业发展话语权的再分配,并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产业新体系,实现生产模式、组织方式、产业形态、竞争规则等的重塑。产业动力逻辑关切的正是产业体系在演进过程中如何获得可持续的内在驱动力,以突破路径依赖与资源瓶颈约束,回答“谁来驱动”“如何驱动”“驱动方向”等核心命题。两者共同指向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动能的重构与赋能。因此,构建现代化的产业动力体系需充分把握发展方式逻辑和产业动力逻辑的深度融合(如表 3 所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坚持创新驱动,明确建设现代化产业动力体系的基本路径。

表 3 发展方式逻辑和产业动力逻辑的深度融合

发展方式逻辑	产业动力逻辑
必须充分吸收科技革命最新成果	必须推动科技创新
必须创新技术—经济范式	必须推动商业模式创新
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的重要作用	必须大力发展新产业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1)充分吸收科技革命最新成果,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不仅是解决当前发展瓶颈的关键手段,也是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全球正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为代表的技术突破,将创造具有高成长性的新赛道新业态,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新周期的核心动力源。为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我国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一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国家应集中资源和力量,重点投入到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核心领域,推动关键核心技

术自主可控,实现“卡脖子”问题的突破。通过设立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鼓励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协同创新,培育本土技术优势。二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简化转化流程,并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励科研人员和企业积极参与成果转化。同时,推动高标准化技术交易市场建设,形成有效的技术交易平台,促进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提升国家科技创新的整体效能。三是建立政府“自上而下”和企业“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政府通过顶层设计、政策举措和资源配置,从战略层面为科技创新确立发展方向,为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同时,企业则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通过市场驱动、自主研发和技术应用,从实践中探索创新路径,提升技术成果的转化效率与应用价值。政府的战略引导与企业的自主探索相互衔接,为推动产业持续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强大合力(原磊,2024)<sup>[45]</sup>。

(2)围绕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科技创新本身并不必然带来企业经济上的效益,为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对市场需求、政策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变化作出及时而有效的响应,并对产品、公司战略、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而这也是企业以商业模式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过程(李晓华,2022)<sup>[46]</sup>。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经济上变得可行,为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带来机遇。一是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高效率决策和个性化服务。大数据决策本质上涉及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以替代传统管理者的程序化决策过程,这将有效解决我国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提高生产与经营的效率。同时,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的卓越运算能力,企业可以“定制”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服务。二是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能够提升我国企业的生产水平和制造工艺,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从而增强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推出更高品质、更卓越性能或完全创新的产品与服务,虽然未必直接导致产量或销量的显著增长,但能够促进企业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迈进,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三是推动业务流程系统性重构,提高生产自动化与柔性化水平。流程再造不仅仅是生产线的技术改造,更是对整个产业链运行方式的全面优化。通过提升生产的自动化与柔性化水平,企业能够在降低人力依赖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同时,要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与管理工具,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等关键环节进行重组和整合,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降低运营成本。

(3)充分发挥金融作用,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产业出现和旧产业消亡是驱动经济形态发生质变的决定性因素,当经济体系中新产业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换,带来生产效率的跃升和新增长动力的形成。从第一次技术革命中以棉纺织、水车、铁制品为代表的新产业,到第二次技术革命中铁路运输与蒸汽机车的扩展,再到第三次技术革命中钢制品、电力设备与重型机械等的发展,以及第四次技术革命中汽车、石化与家电产业的崛起,乃至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计算机、电信与微电子等产业的兴盛,均验证此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4)<sup>[47]</sup>。在新产业形成和发展中,要充分发挥金融的重要作用,实现产业和金融相互融合的行业发展新形态。一是发展壮大长期资本与耐心资本。强化政策导向作用,优化市场环境配置,积极引导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等长期资本有序进入资本市场,支持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同时,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领域聚焦,充分发挥其作为“耐心资本”的重要作用。二是支持金融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金融科技助力产品创新,增加金融产品供给,加强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支持,覆盖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使得更多初创企业、小微企业能够得到金融支持和服务。三是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从历次工业革命发展历程来看,要充分发挥金融对技术创新推动作用的同时,又要有效消除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关键在于构建稳固的微观金融基础体系和实施科学的监管举措,防止金融资源空转套利,引导金融资源依法合规地流向新兴产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4)<sup>[47]</sup>。国家进行金融监管时,既要有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

纳入监管,实现穿透式、全覆盖,同时也要为市场创新活动提供足够空间,避免过度干预。

#### 4. 基于价值导向逻辑和产业功能逻辑,建设现代化的产业功能体系

价值导向逻辑并非简单追求产业效率与技术进步,而是要以高质量发展服务于人的素质提升、能力拓展,促进人更加全面自由的发展,最终实现物质生活的改善与精神生活的充实。产业功能逻辑关注的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系统功能与价值导向,强调其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社会就业、引领技术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与提升社会福祉等方面的多元功能定位,更是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民生关切的重要载体。没有价值导向逻辑的目标统摄,产业体系建设容易陷入产业功能单一、片面的误区;反之,若没有产业功能逻辑的支撑,“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梦想亦难以落地。因此,构建现代化的产业功能体系需充分把握价值导向逻辑和产业功能逻辑的深度融合(如表4所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确建设现代化产业功能体系的基本路径。

表4 价值导向逻辑和产业功能逻辑的深度融合

价值导向逻辑	产业功能逻辑
必须注重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与创造力的充分发挥	必须实现集约发展
必须更好满足本国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必须实现安全发展
必须推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必须实现包容发展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1)以提升人的素质与创造力为抓手,促进产业体系集约发展。当前时代是高素质劳动者竞争的时代,以脑力劳动者为代表的高质量劳动力成为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近十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4%以上,教育资源总体供给不断增强,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脱节,导致人才质量和结构难以完全契合市场的要求,从而制约了人力资本优势的充分发挥。当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对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特别是在高科技和新兴产业领域,人才缺口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应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高校毕业生培养力度。集中精力于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数字经济等关键行业的发展和人才需求,通过产业与教育的深度结合和创新合作,引导院校在高精尖紧缺新工科专业方向上进行建设,推动高校开设机器人工程、增材制造技术等“新工科”专业。同时,应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倾斜,拓展招生选拔的途径,进一步实施并推进用人单位“定制化人才培养项目”,实现校企合作培养,确保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紧密对接。此外,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也极为关键。为了减缓存量劳动力知识的贬值速度,应考虑为终身教育提供法律支持,增强其在经费、时间和师资方面的保障,建立和完善社区学习网络,从而构建全面的终身教育体系。

(2)以更好地满足本国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导向,促进产业体系安全发展。为更好促进产业体系的安全发展,必须要提升产业体系满足本国人民需要的能力,确保在极端环境下,能够实现国民经济内循环的持续稳定,同时要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大力提高各产业领域内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的现代化水平,使产业发展更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实现国际大循环的稳定畅通。我国在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时,要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满足本国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本,在此基础上开展国际化经营,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需求条件可以通过刺激企业改进和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需求条件主要体现在客户需求的形态与特征上,包括国内市场的性质与结构、市场规模及其成长速度,以及国内需求向国际市场需求转化的能力等方面(波特,2002)<sup>[48]</sup>。消费升级是改善需求条件的重要途径,通过支持消费者购买更多更高质量、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来实现,这将带来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高,从而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端化。消费升级具有引领效应,一国市场若率先形成对某类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本国

企业即可先于国外竞争者布局该产业,并进而具备满足国际需求的能力(波特,2002)<sup>[48]</sup>。因此,促进产业体系安全发展,必须要立足更好满足国内市场,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

(3)以推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促进产业体系包容发展。产业体系包容发展是典型的多目标协同过程。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在共同富裕理念指导下,产业发展应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协调统一。要实施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型产业政策,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目标的前提下,借助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与政府的积极引导,将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及调节型产业政策相融合,通过市场手段引导资源在不同产业、价值创造活动及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优化配置,进而达成经济社会的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原磊,2022)<sup>[49]</sup>。在政策目标上,要注重效率与公平有机融合。效率依然是产业政策追求的核心,但必须在公平的硬约束之下,并且要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协同共生。在政策取向上,要加强选择性、功能性与调节性产业政策协调配合。其中,选择性产业政策主要目的是引导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类型企业之间进行差异化配置,通过特定产业和企业的支持、调整以及管制措施,旨在鼓励或限制相应的产业活动;功能性产业政策旨在为产业发展提供制度、环境、公共服务支持等的政策工具体系,其核心目标在于优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而非直接干预具体产业。具体表现为完善市场制度、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公平竞争、支持产业技术的创新与扩散等;调节性产业政策主要基于“以人为本”的原则,强化价值链责任,规范和引导企业价值创造活动,其目的是使产业发展更好地满足利益相关方的多元价值诉求,包括稳定高质量就业,为劳动者创造更加安全和更具包容性的工作环境,引导科技创新活动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解放为根本目的等。

## 五、结论与展望

### 1.研究结论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仅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根基所在,也是其得以扎实稳健推进的核心支撑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是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简单模仿,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国情现实,面向未来发展的经济社会系统性转型。这一转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多个层面(虞崇胜,2023)<sup>[50]</sup>,赋予了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加丰富的内涵,拓宽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目标要求。因此,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时,需深刻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多维度涵义和多目标要求。理论逻辑方面,构建“现代化逻辑”与“产业体系逻辑”相互嵌套的时空分析框架,为系统解构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逻辑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突破既有部分研究从整体性视角抽象化论述的思维局限,丰富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构成的认知深度与解释力。理论内涵方面,从时间演进视角看,现代化逻辑可分解为起点逻辑、路径逻辑、发展方式逻辑与价值导向逻辑,四个维度形成起点判断—路径选择—方式转变—价值实现的现代化进程链条;基于系统论“组分—结构—环境—功能”分析范式,产业体系逻辑被解构为一个由产业要素、产业结构、产业动力与产业功能构成的开放性复杂系统,拓展了系统论原有静态结构分析向动态演化的解释力,也揭示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时所具备的自我适应能力。实践路径方面,建立现代化与产业体系逻辑不同维度之间的映射机制,实现了现代化逻辑与产业体系逻辑的深度耦合与分维路径设计,即建设现代化的产业要素体系、现代化的产业结构体系、现代化的产业动力体系与现代化的产业功能体系,形成从理论建构到实践落地的逻辑闭环。

### 2.边际贡献

本文的边际贡献是:一是理论层面,系统解构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逻辑,创新性地构建了“现代化逻辑”与“产业体系逻辑”双维时空分析框架,厘清了二者之间的逻辑互动关系,拓展并深化

了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认知。同时,在时间演进视角下,现代化逻辑可从起点逻辑、路径逻辑、发展方式逻辑与价值导向逻辑四个逻辑来理解,提炼了不同逻辑的理论启示;在空间系统视角下,产业体系逻辑可划分为产业要素、产业结构、产业动力与产业功能四个逻辑单元,揭示了不同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提炼了相应理论启示。通过对现代化与产业体系的逻辑内涵及理论启示的提炼总结,进一步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关研究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支撑。二是实践层面,建立了现代化逻辑与产业体系逻辑之间的映射机制,提出“四维统筹、分项发力”的实践路径体系,即从产业要素、结构、动力与功能四个维度推动产业体系向现代化转型,为地方政府、行业组织、政策制定者等提供决策借鉴。

### 3. 研究展望

立足本文研究基础,后续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深化和拓展。

第一,形成动态反馈与阶段检验机制。产业体系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演进过程,不仅需要理论上的逻辑解析,更需要实践中的评估与反馈。对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进行科学评估,是把握发展趋势、衡量发展成效、推动发展进程的有力支撑。现有研究虽然尝试根据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征或中央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阐述建立指标体系(范合君和何思锦,2021<sup>[51]</sup>;林木西和王聪,2022<sup>[52]</sup>),但在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上仍存在不足。未来可从“现代化”和“产业体系”不同维度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及多层次的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评价体系,并进行区域比较和国别比较,形成动态反馈与阶段性检验机制,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第二,探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多目标协同机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仅承载着提升国家竞争力、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使命,更要回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诉求,实现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等多重目标的协同统一,不断拓展延伸产业体系价值。然而当前研究多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角度考虑,较少将多目标纳入到统一框架,建立完整的政策体系。建议可从多目标协同的视角出发,分析不同目标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应承担的角色和相互作用关系,构建统筹多个目标的政策协调框架。

第三,关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的中国特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模式,其发展路径深受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与生态地理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一个国家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时,必须立足本国实际,选择与自身国情相契合的发展路径。现有研究不乏对西方国家产业现代化经验的总结与比较,但较少从本土化视角,系统分析我国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独特之处。事实上,我国产业体系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起点、路径选择与价值追求,是一种区别于已有现代化实现方式的“新类型”,这一新类型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内在逻辑与发展理念,也对既有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有益补充。未来有必要从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出发,深入探讨我国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关注国内外在发展模式与战略选择等方面的差异,系统阐释我国独特的发展经验与理论贡献,讲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中国故事”。

### 参考文献

- [1] 邵霞,原磊.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演进、建设现状与发展建议[J].北京:价格理论与实践,2024,(9):28-32.
- [2] 刘钊.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与特征[J].济南:山东社会科学,2011,(5):160-162.
- [3] 詹懿.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症结及其治理[J].大连:财经问题研究,2012,(12):31-36.
- [4] 朱孟晓,杨蕙馨.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内涵与实现[J].济南:东岳论丛,2016,(9):166-171.
- [5] 范明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思路、目标与路径[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8,(9):24-40.
- [6] 洪银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功能研究[J].哈尔滨:求是学刊,2019,(3):91-98.
- [7] 刘志彪.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地位、建设内容、主要挑战与对策[J].福州: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5):5-14.
- [8] 黄群慧.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J].北京:中国中小企业,2023,(2):40-43.

[9]赵霄伟,杨白冰.顶级“全球城市”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成都:经济学家,2021,(2):120-128.

[10]白雪洁,宋培,艾阳,李琳.中国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成都:经济学家,2022,(6):48-57.

[11]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重庆:改革,2024,(2):15-24.

[12]洪银兴.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J].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24,(2):7-9.

[13]曲永义.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J].北京:红旗文稿,2025,(5):24-27.

[14]孙智君,安睿哲,常懿心.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成要素研究——中共二十大报告精神学习阐释[J].广州:金融经济学研究,2023,(1):3-17.

[15]张军,石炼.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阐释和实践方针——兼论上海的探索实践[J].上海:新金融,2023,(3):4-9.

[16]林善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任务和重要路径[J].北京: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5):24-40.

[17]李海舰,李真真,李凌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内涵、问题与对策[J].石家庄:经济与管理,2024,(4):42-49.

[18]刘如,邬亭玉,李佳婧.现代化产业体系理论逻辑构建与路径选择研究——基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视角[J].北京:中国科技论坛,2024,(12):20-30.

[19]张其仔.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J].南昌:企业经济,2024,(6):5-12.

[20]徐金海,夏杰长.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J].重庆:改革,2023,(8):14-25.

[2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2]黄阳华.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三次范式转换[J].北京: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3):109-136.

[23]Rosenstein-Rodan P.N.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43, 53, (210/211): 202-211.

[24]埃里克·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M].杨虎涛,陈国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5]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26]张培刚.工业化的理论[J].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08,(7):221-228.

[27]科林·克拉克.经济进步的条件[M].张旭昆,夏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28]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9]苏东水,苏宗伟.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30]黄群慧.2020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J].北京:经济学动态,2021,(11):3-9.

[31]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田方萌,胡叶青,刘然,王黎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4]庞世伟.论“完整的人”——马克思人学生成论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35]郭雷.系统学是什么[J].北京:系统科学与数学,2016,(3):291-301.

[3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37]钟茂初.第一生产要素: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J].哈尔滨:学术交流,1996,(5):8-11.

[38]黄庆华.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N].北京:经济日报,2024-06-18(10).

[39]吕明元,陈维宣.产业结构生态化:演进机理与路径[J].西安:人文杂志,2015,(4):46-53.

[40]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42]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J].北京:经济学家,2013,(1):5-11.

[43]维诺德·托马斯,王燕.增长的质量(第二版)[M].张绘,唐仲,林渊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

[44]邱耕田,张荣洁.论包容性发展[J].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11,(1):53-57.

[45]原磊.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J].北京:瞭望,2024,(1):1-2.

[46]李晓华.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互动机制与政策导向[J].长沙:求索,2022,(5):179-188.

[4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结构变迁、效率变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J].北京:经济研究,2024,(4):4-23.

[48]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9]原磊.推动共同富裕的产业政策研究[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2,(5):18-31.

[50]虞崇胜.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属性:现代性、中国性、世界性[J].重庆:探索,2023,(4):15-28.

[51]范合君,何思锦.现代产业体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政府人才数量的调节作用[J].北京:中国流通经济,2021,(12):16-27.

[52]林木西,王聪.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J].北京:经济学动态,2022,(12):23-36.

##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Construct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YUAN Lei<sup>1</sup>, WANG Shan<sup>2</sup>

(1.History Research of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deployment put forwar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tudy and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is strategic deployment, and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In the new era, construct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an essential task for our country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This task requires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and to actively 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 dual dimensional spatiotempo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prising “modernization logic” and “industrial system logic.” These two dimensions interact dynamically and support each other, and embody the organic unity between the national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evolution, the “modernization logic” can be theoretically explained from four dimensions: starting point logic, path logic, development pattern logic and value orientation logic. Four dimensions form a progressive logical chain of starting point assessment – path selection – pattern transition – value realization. Starting point logic focuses on answering how late developing countries select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paths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f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element endowments. Path logic, dominated by industrialization, consolidates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of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rough the transition from light industry to heavy industry and from primary processing to high value-added manufacturing, driv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existence” to “completeness” and ultimately to “excellence”. Pattern transition logic no longer relies on traditional element inputs or low-cost advantage models. Instead, it undergoes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reshaping production modes,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s, reflecting the essence of endogenous innovation. Value orientation logic is characterized by promoting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man. It focuses on improving human quality, expanding individual capabilities, and enhancing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B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public wellbeing, it aims to build a human-centered and multiple functional industri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s theory, the “industrial system logic” can be theoretically interpre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industrial element logic, industrial structure logic, industrial dynamic logic and industrial function logic. Industrial elements include resources such as labor, land, technology, capital, and data. Their accumulation,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ve allocation lay the foundation and prerequisite of industrial system oper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refers to the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such as industrial chains, value chains, and regional divisions. It serves as the core for guiding internal coordination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ystem. Industrial dynamic refers to the exchange of matter, energy and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system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y function as the “engine” of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and determine evolutionary direction and trajectory of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 function emphasizes the multiple and integrated roles undertaken by industrial system in supporting economic operations, safeguard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serving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for assessing industrial system modernization level.

Based on respective emphases and content linkage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between modernization logic and industrial system logic, this study proposes a basic path for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First, construct a modern industrial element system based on start point logic and industrial element logic. Second, construct a modern industrial structure system based on path logic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logic. Third, construct a modern industrial dynamic system based on development pattern logic and industrial dynamic logic. Fourth, construct a modern industrial function system based on value orientation logic and industrial function logic.

**Key Word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path

**JEL Classification:** L10, O25

**DOI:** 10.19616/j.cnki.bmj.2025.10.001

(责任编辑:刘建丽)